

觀念起源的猜想與證明

——兼評《「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

金觀濤^{**}

摘 要

本文通過對「革命」一詞在中國近代政治文獻中的統計分析和計量研究，檢討中國現代革命觀念在清末民初的起源；並以此為案例，討論數據庫的方法對觀念史研究的意義，認為今後有關觀念起源的哲學和理論有可能用新的工具加以檢驗和證明。

關鍵詞：中國近代思想史、觀念史、革命、思想史研究方法

在全球告別革命的今天，對革命這一觀念的探討已不如幾十年前那樣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興趣。但陳建華先生在 2000 年發表的著作《「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卻一反時尚，力圖追溯中國近代革命觀念的起源。我認為，這本書在今天出版，本身就有著不可忽略的思想和學術價值。

早在 1980 年代初，陳建華因懷疑「詩界革命」是由譚嗣同、黃遵憲在戊戌前提出的說法，即深入西方 revolution 觀念如何傳入中國的漫長而艱巨的考

^{*} 收稿日期：2003 年 5 月 2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 年 8 月 14 日。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證。經過長時間研究，陳建華有兩個重要發現：第一、原以為戊戌前就有詩界革命的論點是沒有根據的，最早提出「詩界革命」的是梁啟超(1873-1929)，時間為 1899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海外，因受到日本影響，他在其著名的〈夏威夷遊記〉中第一次提出「詩界革命」，當時在「詩界革命」的論述中，已具有西方 revolution 觀念的諸含義。¹陳建華認為，這是中文語境中「革命」一詞開始擺脫傳統意義而具有現代革命觀念的源頭。²第二、最早用「革命」這兩個漢字來譯“revolution”的是日本，1890 年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中因受到日本岡本監輔(1839-1905)《萬國史記》的影響，將“French Revolution”譯為「法國革命」。開啓中文語境中用「革命」指涉 revolution 的先河。³

研究觀念的起源離不開新詞彙的產生、傳播和意義的考證。陳建華在考證方面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績值得肯定。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人們經常懷疑這些瑣碎的考證對研究重大觀念的起源究竟有甚麼用處？我認為，上述考證有助於對中國現代革命觀念的起源（包括西方革命觀念的傳入）作出新的猜想。「革命」在中國傳統語境中的本意是改朝換代，陳建華指出它獲得西方 revolution 的現代意義是在 1899 年，而不可能是戊戌之前，這一點非同尋常。我們知道，戊戌變法的失敗在少數激進知識分子心目中意味著再也不可能依靠清廷改革，於是開始萌生推翻滿清王朝的觀念。也就是說，現代革命觀是隨著改朝換代的正當性興起應運而生的。這樣，西方現代革命觀念從一開始傳入中國，就與傳統王朝更替機制一起共同塑造了中國現代革命觀念，從而使得中國現代革命觀念和西方不完全相同。

一談起中國現代革命觀，人們很容易望文生義。如從獸皮去毛成革來理解「革」，把「命」直接理解為性命。這樣似乎中國傳統革命觀中已有現代

¹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4、196。

² 陳建華，〈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二十一世紀》，總第 41 期（1997 年 6 月）。

³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頁 30-36。

「革命」一詞中革某人或某階級命的暴力化含義。陳建華的著作亦有這種簡單化傾向。其實中國傳統革命觀的暴力含義來自於改朝換代，而不是今日中文語境中革某人的命。「革命」由「革」和「命」兩個漢字組成。從詞源上考察，依據許慎的解釋，古文「革」字上為「廿」，下為「十」，其含義是「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種週期性更替。⁴後從中引申出獸皮去毛即皮革，或代表人為地改變某物，並用於占卜。「命」最早的意思為君主下令，以形成某種秩序。據《禮記·祭法》云：「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這樣「命」亦用於表示某種天給予的秩序。所謂天命和性命均從天所賦與的這一層含義中引出。故命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和英文“order”相當。「革」與「命」兩個字的聯用，是表達某種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變化，其意義相當接近於西方 *revolution* 原意，即天體週期性運動或事物周而復始地變更。早在《周易》中已有「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用法。故自漢代開始，「革命」已成為週期性王朝更替、改朝換代的代名詞。中國傳統文化中革命的意義，就是由改朝換代所塑造的。這一點對於理解中國現代革命觀的深層結構格外重要。

人們自然會進一步追問，既然戊戌之前西學東漸過程早已開始，為甚麼士大夫仍是用中國傳統的革命觀理解西方的 *revolution*？我認為，這時陳建華的第二個考證就很重要了。正因為王韜將“French Revolution”譯成「法國革命」，使得在戊戌前十年法國大革命這一特定事件成為士大夫接受西方 *revolution* 觀的中介。陳建華接著挖掘，既然王韜用「革命」譯“*revolution*”是受到明治時代的日本影響，那麼中國現代革命觀的確立，除了需要考察西方革命觀念的傳入外，還必須研究日本革命觀和中國革命觀的互動。但他立即發現，自 1902 年大量中國留學生從日文文獻中接受西方和日本革命觀開始，中國現代革命觀與日本近代革命觀的距離就拉開了。在日本，明治維新被稱為「革命」。在日本近代思想中，革命代表著進步，有徹底改變的含義，

⁴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三篇下，頁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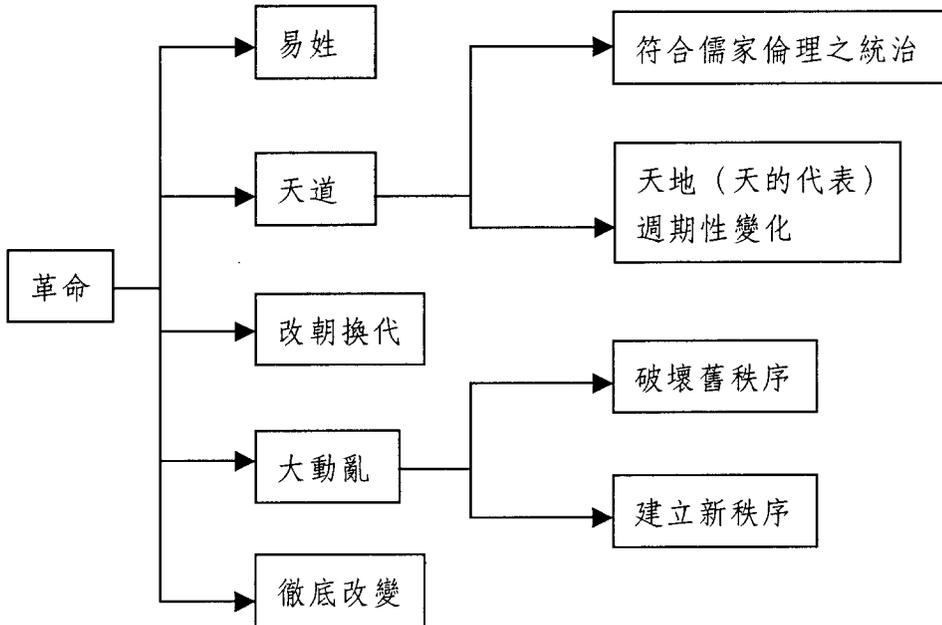
但無改朝換代的意思，更沒有中國現代革命觀中建立道德理想國——烏托邦社會的想像。爲甚麼中國知識分子從日文文獻中理解 *revolution* 時，並沒有接受日本近代革命觀中改良維新的含義呢？

法國大革命是中國用「革命」譯“*revolution*”的中介，我認爲陳建華也許忽略了它的思想史含義。因爲在中國學習西方近代革命觀的過程中，這一中介使傳統革命觀的深層結構頑強地表現出來。首先，法國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事件既可以看作舊王朝被推翻——此看法可以和中國傳統社會王朝更替的現象建立聯想；同時，它亦可被理解爲用暴力徹底破壞舊制度，建立全新的社會秩序。這一歷史事件有多重的解釋和思想史含義，採用哪一種含義，往往取決於接受者持何種觀念系統。例如，當士大夫相信退化或循環史觀，而改朝換代又沒有獲得正當性時，*revolution* 則意味著大動亂，具有負面含義。一旦清王朝合法性被質疑，知識分子則主張用徹底推翻舊秩序建立符合天道的新制度來理解法國革命時，西方的 *revolution* 的種種新含義也就進入中國現代革命觀，但王朝更替的想像仍會在某種深層結構上保存下來。也就是說，很多中國人雖然是通過日本的翻譯瞭解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的，但更重要的是，法國大革命這一中介的存在有利於中國傳統革命觀念對西方革命觀念進行選擇性吸收和創造性重構。相比之下，日本近代革命觀對中國現代革命觀念的最後確立反而不是那麼重要的了。⁵

在此，我們有必要粗略地勾勒一下中國傳統革命觀是如何參與塑造現代革命觀的思想史過程。首先，由於中國傳統革命觀的意義結構具有王朝易姓、天道週期性變化、大動亂、徹底改變等含義，它存在如圖一所示的整體結構。中國現代革命觀的形成即爲該結構對西方 *revolution* 觀念之重塑過程。

⁵ 金觀濤，〈革命、改良和反動〉（未刊稿），2003年3月28日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宣讀。

圖一 「革命」一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義結構



戊戌之前，清王朝統治的正當性沒有受到質疑，「革命」一詞在政治文獻中很少出現，即使用於指涉法國大革命，士大夫亦是用傳統改朝換代想像 revolution，革命完全是易姓、大動亂的代名詞，這時法國大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是被納入該結構來理解的。戊戌政變之後，激進的知識分子對清廷改革絕望，改朝換代獲得正當性。但在西學東漸的現代化潮流中，易姓和改朝換代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即傳統王朝這樣的社會制度已不能在現代世界中「適者生存」，而且傳統宇宙秩序和儒家道德也不能再充當革命意義結構中天道的內涵，這時，徹底變革、建立符合新天道社會秩序這些含義，就保存在對法國大革命的想像之中。如圖一所示，天道隨時移世易可以被進步觀或辯證唯物論取代；與天道相對應的儒家倫理道德內容，也可以變為主張取消一切差別的平等思想。中國現代革命觀的內容雖和傳統革命觀不同，但整體

結構變化不大。因此，當中國式現代革命觀成爲至高無上的新道義，並作爲新社會制度正當性的基礎時，傳統的改朝換代仍會在某種潛在的結構中保存下來。在此我不想花太多的筆墨討論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傳統改朝換代的色彩，只是想指出，根據同樣的史實，往往可以提出不同的猜想，但哪一個猜想更符合歷史的真實呢？這就涉及到觀念起源的猜想和證明，它是歷史和哲學研究中未曾深入探討的問題。

通常一談起猜想與證明，人們立即想到科學理論和科學哲學，它與思想史研究相差十萬八千里。兩者之所以被認爲不相關，乃因爲科學猜想是全稱陳述，事實討論是單稱陳述。再多的事實亦不能證明全稱命題，故波普爾(Karl R. Popper)認爲科學研究中只存在猜想與反駁，而不是猜想的證明。在史學研究中，我們處理的大多是單稱命題。對單稱命題，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事實是否成立和解釋是否合理，而不是作超出個別事實的具有普遍意義之猜想。⁶ 這樣，根據某一可靠史料提出的觀點也不存在所謂證明的問題。但我認爲，觀念起源問題卻不是上述科學理論和人文解釋兩種典範所能包括的。

所謂觀念的起源，不是指某一個人特有的思想，它亦不是某一時代所有人的思想。換言之，和某一觀念起源有關的命題既不是單稱陳述，亦不是全稱陳述。它是涉及一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命題。探討歷史上流行一時的觀念起源及其過程，需要追溯原本屬於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觀念，它是如何形成、發展、傳播而成爲一群人或那個時代佔主導地位的思想。這往往需要先根據個別史料來猜想，然後再用和許多人思想有關的史料（如相應關鍵詞出現的頻度）來驗證原先猜想的對錯。事實上，這必須運用猜想和證明的研究方法。但是，由於統計某一術語最早出現的時間與它的傳播和普及過程十分困難，故以往的觀念史研究中很少用猜想和證明這種研究方法。觀念起源探索被迫分裂爲兩個互不相關的部份：哲學家根據觀念內在邏輯提出新觀念產生之理

⁶ 當然對於單稱陳述，也可以先提出猜想，然後從史書或出土文物中去找證據。胡適將這種研究方法概括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種適用於考據的方法，不能用來證明歷史學家根據史料提出的史觀，或對某一時期普遍精神狀態或文化的描繪。

論思辨；而歷史學家在艱難繁瑣的事實考證中追溯某一個詞在甚麼時候最先運用，但這種考證和哲學思辨無法建立聯繫。也就是說，猜想和證明不能聯成一體並在觀念史研究中系統地展開。我認為，自 1990 年代大量歷史資料電子文本出現，特別是通過建立有關研究中國近現代觀念演變的數據庫，⁷我們可以在中國近現代觀念起源研究上系統地運用猜想和證明的方法。中國現代革命觀念起源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

表一是我們根據有關數據庫檢索得到的 1894 年至 1911 年間「革命」一詞出現的頻度和意義。⁸從表一可見，1898 年前，「革命」一詞除了傳統含義

⁷ 筆者曾推行一系列研究計畫，用以建立中國近現代觀念演變的專業數據庫。這一系列研究計畫如下：1997 年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為期兩年的研究計畫：“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CUHK4001/97H)”；2000 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的“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 1736-1927 (RG018-D-99)”；2002 年 4 月香港中文大學資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a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2002 年 9 月開始 RGC 資助的新研究計畫“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

筆者在此向上述資助機構致謝。

⁸ 目前，本數據庫包含了 1830 年至 1911 年間約 3,210 萬字思想史文獻，主要有：

一、傳教士中文著作：

1. 愛漢者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或譯郭實臘) 等編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約 36 萬字)；
 2. 惠頓(Henry Wheaton)著,丁韞良譯,《萬國公法》(約 10 萬字)；
 3. 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應祖錫筆述,《佐治芻言》(約 12.6 萬字)；
 4.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蔡爾康編,《中東戰紀本末》(約 78 萬字)；
 5. 傅蘭雅,《格致彙編》(約 178 萬字)；
 6. 赫德(Robert Marto)、威妥瑪(Thomas Wade)、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著述文選；
 - 7.《萬國公報文選》(約 50 萬字)；
 - 8.《泰西新史攬要》(31 萬字)。
- 以上共約 400 萬字。

二、士大夫的著述：

- I 文選：阮元、包世臣、龔自珍、徐繼畲、林則徐、黃爵滋、郭嵩燾、王先謙、曾紀澤、薛福成、宋恕、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劉師培等人的重要政論文選，共約 266 萬字。
- II 重要專著：1. 容闕,《西學東漸記》；2.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3.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4. 鄭觀應,《盛世危言》、《易言》；5.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6. 許楣,《鈔幣論》；7.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實理公法全書》、《大同書》；8. 陳天華,《警世鐘》；9. 劉師培,《攘書》；10. 張之洞,《勸學篇》；11. 何啓、胡禮垣,《新政真詮》；12. 譚嗣同,《仁學》；13. 章炳麟,《噶書》；14. 徐繼畲,《瀛寰志略》。以上共約 210 萬字。

- III 嚴復、梁啟超著述全集,約 1,350 萬字。

(包括王朝更替意義上的排滿)外,主要用於指法國革命,這說明法國革命是最早架起「革命」一詞和 revolution 的橋樑。而在 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革命」一詞的眾多新含義開始出現,代表徹底變革的「宗教革命」、「詩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舊王朝的「經濟革命」、「排滿革命」在激進知識分子中傳播,開始波及幾乎一切觀念領域。

表一 1894 年至 1911 年「革命」所指涉的種類(以出現次數為單位)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易姓			1		9	3	2	7	4		10	3	7	8		1	2	
湯武		1			1				6	2	2		1	3	2			1
動亂	1				1	2		1	4		7	2	15	27	10	8	3	1
變法									2			2	5	18	5			
推翻 舊政府																	3	2
法國			1		10	9		14	31	41	22	19	102	21	9	15	10	1
俄國						1		2				10	9	10	2	3	1	
美國					3			1	2		1	1	6					
英國						1			8	1	1	2	5	1	2	4	1	
日本					1	1			2									
土耳其					2												3	
歐洲 ／列強					2	6		3	11		12	2	12	1	2	1		
排滿 ／種族			1		3			1	2	3	2	44	131	24	8	3	1	
私人											1		1					
團體											1		1					
政治						1			1	32	4	43	228	19	9	1	2	
經濟						1		2		2	2	1	5	5	2			
家庭										1	16			5	2			
風俗										1			1					
女子						1			1	2	9		1	9	3			
社會										2	3	17	170	53	10		1	
工業										5		21	11				3	2

IV 近人選本：1. 翦伯贊、劉啓戈等編，《戊戌變法》，冊 2、3（80 萬字）；2. 鄭振鐸編，《晚清文選》（87 萬字）；3. 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212 萬字）；4. 王彥威等編，《清季外交史料》（共約 375 萬字）。以上共約 750 萬字。

三、重要報刊：

《時務報》，235 萬字。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生計										1								
詩界						1		2	2									
宗教						5			8	6	1	2	6		2		1	
文界									3	1	3			4				
~時代									9	2	6	5	9	2			2	
~主義 /論									4	1	6	17	9	5	3	1	6	2
~事業									1		2	3	5	1	1			
~家									4	1	4	6	19	2	1		3	1
~者			1				1	1	19	31	7	29	105	58	29			1
~派					2						1	1		2				
~黨						7	1	9	9	10	18	6	32	34	14		14	10
~軍					2			1	11	12	17	26	127	20	6	1	4	
~思想									3	3		3	5	7	1		6	
譯法									5									
其他			1		2	7	3	*	*	*	*	*	*	*	*	2	*	15

註：本表採用「關鍵詞」為檢索原則，而非逐項檢索以定「革命」所指涉的種類。故「其他」一列中打記號(*)即表示該年有關「革命」之紀錄達一百條以上。此外，在個別情況下，同一條紀錄可能出現多過一次，如「政治革命思想」條則會被記入「政治革命」一次及「革命思想」一次。

綜上所述，中國現代革命觀起源於戊戌之後，這一猜想是可以用數據庫方法證明的。雖然從我們建立的數據庫文獻來看，最早賦予「革命」一詞現代含義的不是陳建華所講的「詩界革命」，而是「宗教革命」，時間為1899年夏。梁啟超在〈論支那宗教改革〉中曾這樣寫道：

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繫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繫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繫乎國民之所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為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興也。蓋宗教者，鑄造國民腦質之藥料也。我支那當周秦之間，思想勃興，才智雲湧，不讓西方之希臘。而自漢以後，二千餘年，每下愈況，至於今日，而衰萎愈甚，

遠出西國之下者，由於誤六經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賤儒務曲學以阿世，君相託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見。此實東方之厄運也。故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而南海先生所發明者，則孔子之教旨：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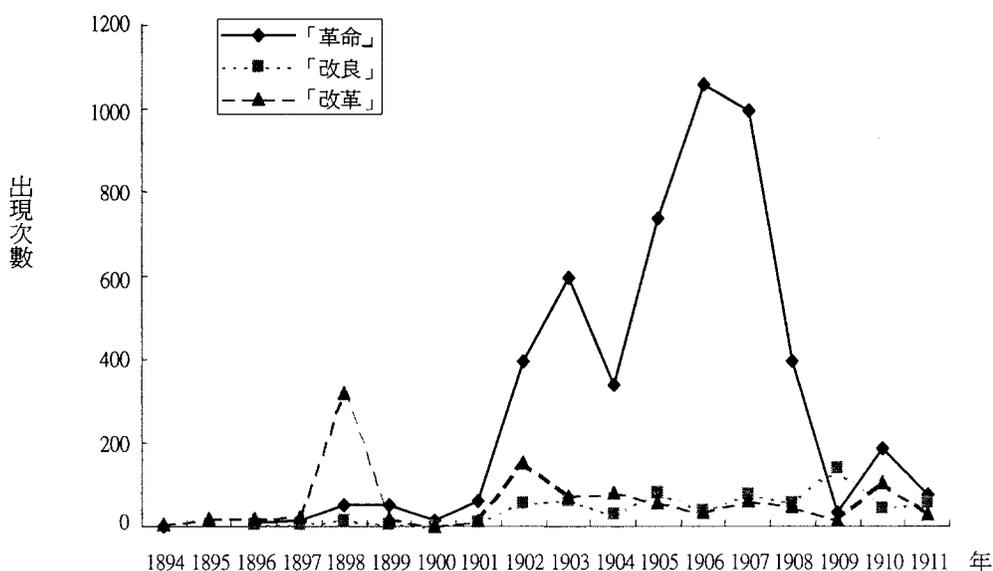
這裡梁啓超雖仍沒有完全擺脫康有爲的今文經學，但「革命」一詞不僅已具有西方 revolution 中徹底改變和進步等幾種現代含義，而且存在著徹底更替意識形態、用新意識形態改造社會之構想；而這正是具有改朝換代潛在結構的中國式革命觀的影子。¹⁰

圖二是數據庫中「革命」、「改革」、「改良」三個詞的出現次數按年度統計的頻度曲線。曲線表明：1898年「改革」一詞凸現，頻度遠遠高於其他年代，相比之下「革命」一詞很少出現。要等1900年庚子事變後「革命」使用頻度才不斷上升，終於在1903年和1906年達到兩個高峰。1908年後「革命」出現頻度開始減少，一直到新文化運動中（特別是1919年後）才再度凸現，並在1920年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見圖三）。這一宏觀統計或許比個別事實的考證更能證明：中國現代革命觀念的起源和清王朝統治合法性喪失，令改朝換代獲得正當性有關。

⁹ 梁啓超，〈論支那宗教改革〉，原載1899年6月28日（引文見於此日）、7月8日出版之《清議報》，此據《飲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55-56。新式標點係引者所加。

¹⁰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文章的標題是〈論支那宗教改革〉，但在文中卻將「宗教改革」稱爲「宗教革命」。或許這同當時日本將「宗教改革」稱爲「宗教革命」有關。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正表明日本革命觀從一開始便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理解革命觀念。但是這種影響很快被中國文化本身對革命的理解所抵消。就以梁啓超爲例，上述文章將「宗教革命」和「宗教改革」等同，證明1899年梁啓超尚未在觀念上將改革與革命區別開來，但很快這種狀態便告結束。衆所周知，梁啓超明確指出革命和改革不同是在1902年。梁啓超在〈釋革〉一文中，一開始就指出日本用「革命」譯“revolution”是一個錯誤。因爲在中文語境中「革命」一詞必蘊含易姓和改朝換代，而“revolution”只是徹底變革，和易姓與改朝換代並不相關。爲了與徹底變革相區別，他將“reform”譯爲「改革」；改革可以由當政者推行，並不一定是整體徹底的變革。

圖二 1894 年至 1911 年間「革命」、「改革」、「改良」三個詞出現之頻度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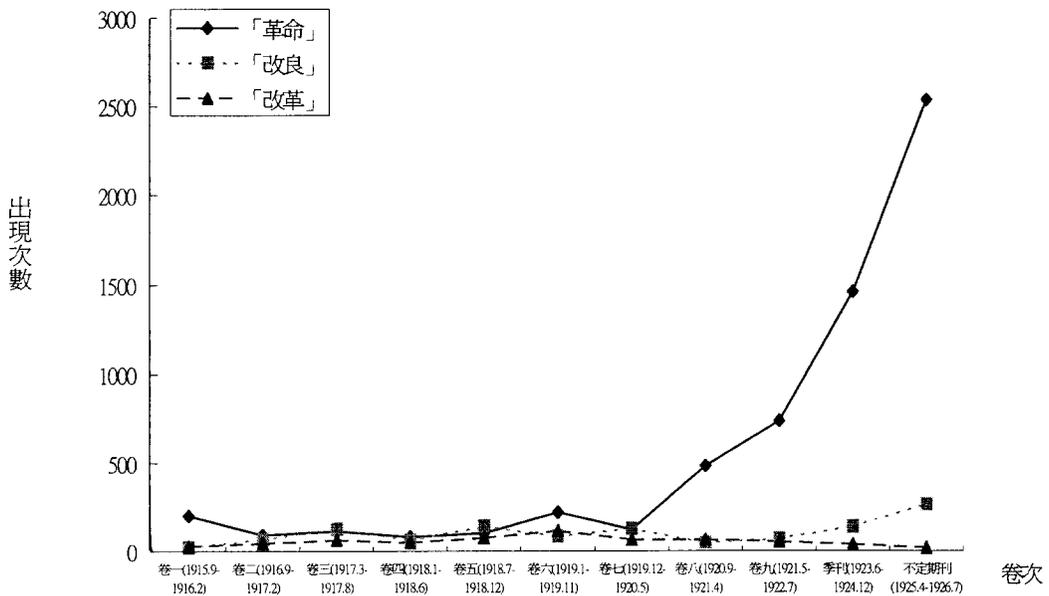
我認為，必須重視 1898 年「改革」一詞出現頻度遠遠高於「革命」這一事實。改革和革命的意義差別在於：改革為當權者推行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而革命是推翻舊王朝，重建新秩序。1898 年「改革」的勃興顯然和戊戌變法直接相關，正是戊戌變法的失敗特別是庚子事變使激進知識分子否定清王朝統治的正當性。從此傳統革命觀開始獲得西方 revolution 諸含義，並向中國現代革命觀轉化。郭廷以曾把 1900 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比喻為在中國領土內的世界大戰。它意味著作為改革的百日維新流產後，清廷利用義和團全面排外和反洋人的失敗。在激進知識分子心目中，清廷已成為腐敗、無能、賣國的象徵。正如陳天華所說：

政府之不足與有為也，殆已成鐵據。……中國未有於一朝之內，自能掃其積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於以除舊布新，然後積穢盡去，民因

克蘇。不革命而能行改革，烏頭可白，馬角可生，此事斷無有也。¹¹

這裡，明白地道出革命對改革的取代關係。推翻舊王朝的革命一旦獲得正當性，排滿革命說、共和革命說即隨之興起。而 1903 年之所以成為革命觀念普及的關鍵年代，是和俄國在庚子事變中佔領東北並拒不撤兵直接相關。1903 年拒俄運動在留日學生和激進知識分子中風起雲湧。事實上，知識分子自行組織拒俄義勇軍等同於否定清廷的合法性，當時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說法：「名為拒俄，其實革命」。¹²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 1903 年是「革命」一詞使用的第一個高峰。

圖三 《新青年》雜誌「革命」等詞使用頻度曲線



¹¹ 陳天華，〈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原載《民報》第 1 期，載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卷 2，頁 124。

¹²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原載《江蘇》第 4 期，載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 1，頁 560。

「革命」一詞在 1906 年呈現的第二個空前高峰，則是因為日俄戰爭帶來巨大的思想震撼。在清廷和廣大士大夫心目中，日本戰勝俄國是君主立憲制度優於皇帝專制的明證。清廷派六大臣出國考察，準備在十二年後改為君主立憲政體。清廷的改革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大爭論，主張立憲的士大夫認為共和與社會革命會導致中國被瓜分，共和絕不可取。在主張革命的知識分子看來，清廷作為少數民族政權，已淪為列強的奴隸，根本無能力立憲。而且即使實行君主立憲改革，也不能解決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中國在變更了政治體制之後，仍難以避免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孕育的社會革命。1905-1908 年，革命派和立憲派關於君憲的大論戰發生，並以 1906 年為最激烈的一年，因此「革命」一詞的出現頻度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這一方面表現出論戰之激烈，另一方面亦標誌著革命各層次的意義，從排滿、共和到經濟領域的徹底變革——呈現出來。自 1908 年起，「革命」一詞的出現頻度開始逐步減少，1910 年後其頻度降至一百次以下。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清廷預備立憲有效地遏制了革命思潮的傳播，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改革失敗引起革命勃興、而改革順利則革命消沉這一革命和改革之間的邏輯聯繫。圖三是根據《新青年》作出「革命」一詞的頻度變化，從中可見 1919 年前，在這份最有代表性的激進刊物中，「革命」這個詞的使用頻度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多。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新文化運動中特別是 1919 年後「革命」一詞的再度勃興是意味深長的。如果忽略革命觀念背後的深層結構，在史學家稱為「革命之再起」的 1920 年代，¹³表面上看到的只是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取代原有法國大革命在歷史上的神聖地位。但是只要將 1919 年後革命之再起和清廷立憲、民初共和時期革命曾一度淡出的現象相聯繫，立即發現革命再起本質上仍是對 1906 年清廷模仿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失敗的回應。也就是說，隨著現代化運動導致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中國原有的改朝換代機制在某種意義上再度啟動了。當然

¹³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要證明中國共產革命，特別是利用農民革命戰爭重建社會秩序中存在著傳統改朝換代的影子，僅僅依據上述統計仍是不夠的。爲此我們除了研究中西現代革命觀的差異外，還必須深入分析中共用革命意識形態整合社會的結構；這都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展開的。但是「革命」這個詞本身的歷史含義，或許是歷史變遷存在著深層結構的某種證據。文化大革命中當毛澤東以革命的名義大搞個人崇拜和文字獄時，紅衛兵大概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狂熱信奉的意識形態中「革命」這個詞的原意，本爲他們所不屑一顧的所謂封建王朝的更替。

這一切似乎表明，今天觀念史研究也許有著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重要性，因爲僅僅靠否定和忘卻來擺脫某種觀念的束縛會導致我們進入失語狀態。知識分子如果想從批判精神喪失的無力感中解放出來，就必須研究那些我們長期沉迷的觀念起源。而數據庫的建立和統計方法的運用則可把觀念史研究中理念型方法和經驗證據之尋找統一起來，使得本來分別屬於哲學家 and 歷史學家的工作聯成一體。這就是觀念起源的猜想和證明的統一。

徵引書目

一、文集

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

二、論文

金觀濤，〈革命、改良和反動〉（未刊稿），2003年3月28日在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宣讀。

陳建華，〈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二十一世紀》，總第41期，1997年6月。

三、專書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四、數據庫

《中國近現代觀念演變專業數據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3。

The Origin of Ideas: Conjecture and Proof —
A Review of *The Modernity of “Revolution”*:
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Jin Guantao *

Abstract

This essay uses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ncept of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this research the term *geming*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exts i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is investigation is presented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use of databas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author recogn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research tools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hypotheses and theories of the origins of ideas.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history of ideas, revolu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